

外交学研究

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现代科学因素^{*}

傅菊辉¹, 陈亚东²

(1.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2. 湘潭大学 国际政治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外交信息的接收范围, 提高了反馈的速率, 系统的决策理论成为指导外交决策的方法论, 外交咨询机构科学化、专业化的工作提高了外交决策的效率。外交决策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变。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现代科学因素愈发凸现。

关键词: 外交决策; 现代科学因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7)05- 0129- 05

作者简介: 傅菊辉(1954-), 男, 湖南湘乡人,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陈亚东(1981-), 男, 河南信阳人, 湘潭大学国际政治系 2005 级硕士研究生。

决策(decision making)最初是指个体在既定的环境中, 根据客观和主观的实际境况, 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 最终决定采取某项行动。“所谓决策, 是对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备选方案作出抉择的行为”。^[1](P501)] 外交决策即是国家对于外交政策作出决定的过程。“外交决策过程包括四个层次: 情报搜集系统、情报综合系统、决策系统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反馈”。^[2] 凭个人经验和智慧进行决策的传统外交决策, 已经不符合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 决策的内容日趋复杂多样, 现代决策通常包含着众多的目标、变量、信息、关系, 决策者个人无论是在知识和经验上, 还是在精力和时间上都难以胜任。“世界各国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 已经普遍建立了从情报、咨询、决策、执行、监督到反馈系统的组织

健全、结构合理、功能明确、效率高速的科学化、现代化外交决策机制”。^[3] 外交决策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因素不容忽视。

一、科技因素与外交决策相关信息

(一) 现代科技极大丰富了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 拓宽了外交决策的领域。

外交决策离不开对国际信息的把握。情报信息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搜集越为详尽, 决策分析就更加全面透彻, 可靠性也就越高。美军珍珠港遭袭的原因调查表明, 当时能够提示袭击正在来临的重要信息尽在美军决策者的手中, 然而有过多的“噪音”——不重要或不相干的信息, 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被忽略。“噪音是信息过载的特征, 过载强迫

* 收稿日期: 2007- 06- 22

我们选择信息进行考虑,却隐藏了真正信号使其变得模糊”。^{[4](P171)}现代传媒技术、传播网络与渠道不断发展,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大容量、高速流动和扩散,形成了丰富的国际关系信息资源。面对着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各国政府努力实现外交决策信息最佳化的余地大大拓宽。丰富的信息流为外交决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从而使各国的外交行为更富确定性,同时也使得对信息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传统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外交人员的搜集,到后来发展到报纸、广播、电视等,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信息来源空前拓宽。其不受时空限制,全球连为一体,官方和民间的信息交汇。未来学家托夫勒曾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外交决策者不但要面对传统的国际政治行为体,还要让本国的外交政策广为人知。如在战后兴起的公众外交,就是国家在科技和社会发展新形势下进行对外决策必须兼顾的重要外交领域。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国家外交不但要在政治、经济等所谓高级层次上纵横捭阖,而且要在外交决策相关的国际信息传播等方面给予重视。全球市民社会正在蓬勃发展,影响力在逐日增大,这是现代外交决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二) 现代科技使情报信息系统日趋成熟,形成功能完备、巨大的情报网络。

直属于国家和外交决策部门的情报机构纷纷建立,规模不断扩大,高科技情报搜集分析手段得到应用,从事情报工作人员素质趋于专业化,信息情报活动和程序趋于成熟。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政府通讯总部,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军事情报局,德国的联邦情报局,日本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情报调查局、联合情报会议等。这些机构和部门专门从事信息情报的搜集、整理、加工、分析、贮存和传送,保证信息情报的准确、有效和准时。“攻击某一国的方法,使限制其情报流通,……围绕某一国家建立情报墙。有一个新的用语‘情报主权’已经进入国际关系词汇中”。^{[5](P219)}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认定,若情报工作做得好的话,珍珠港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发誓说“我们决不能在没有一个情报中心的条件下管理我们的政府”。

各国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情报网络,使地球大大“变小”,而且越来越“透明”。情报学、资料学、搜集学等新兴学科的逐步建立并发展,对于情报源、资料源、获取技术等研究不断深化。网络和计

算机技术如语言翻译、密码破译、图像判断、信号解码等保障了信息的高速存储、处理和流动。科技也保障着情报的安全,如正在研究的量子通信技术,将成为最安全的通信手段。卫星和无线通讯是远程数据监测、搜集处理的灵魂,先进的信号情报卫星以及布置在飞机、舰船、地面上的各种电子设备,窃听各国电话、卫星电话、无线电报、海底电缆等。如日本建有亚洲最大的电子监听阵地。据1997年1月27日《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国务院的通讯中心就像一个信息交换站,数千条海底电缆每天在中心和各使馆之间传递大量信息,……运营手段越来越复杂精密,通讯卫星可以瞬间将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传往国务院,电子发送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正在取代传统的纸张打印”。“现在国家安全局什么都窃听,或者说什么都窃听,可以说95%的通讯都经过了它的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的过滤,几乎全部的电话、文传、电子邮件和信息传递都可以被截获”。^[6]“对于伊拉克战争的部署,萨达姆·侯赛因知道多少,美国就能知道多少”。

科技有时还帮助在外交中传递虚拟信息,如1989年西方国家曾利用计算机合成技术传播所谓“罗马尼亚安全部队大肆屠杀群众”和“死难者尸体难以计算”等伪造电视画面以激化矛盾。

(三) 信息化外交战略已经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信息化的发展对传统的外交精神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现代外交面对众多考虑,必须加以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各国都开始进行外交决策系统方面的改革,电子外交战略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以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效率。如2000年5月15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签署了《关于科学技术:致国务院全体职员备忘录》、《关于科学技术和外交的声明:科学与外交 加强21世纪国务活动》。“在一个正被技术改造的世界,有效的科学对有效的危机至关重要”。其核心是通过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外交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以提高外交人员的科技素质来提高外交工作为国家服务的层次,扩大服务范围。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后不久即提出要尽快实现英国公共服务设施传送的电子化。在办公的电子化、网络化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1999年,英外交部宣称,为提高外交部的办公效率,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的联络在2000年用保密的电子邮件代替电报。外交大臣库克提出“外交部现代化战略”,进行多项改革,意在建立开

放、现代化的英国外交机构。2002年6月,工党政府出台《e外交:外交部长和英联邦事务部的电子商务战略》,“旨在使外交部从一个有很多分支机构的指挥部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单一的网上机构”。^[6]日本正在实施由过去的“为了科学技术的外交”向“利用科学技术外交”的转变,帮助这个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利益。印度也在进行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

(四) 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外交决策过程增加了新的变量。

网络传媒能够更全面、更及时、更频繁的报道国内外事务,网民们拥有像电子邮件、论坛、BBS等新的传播媒介,有了新的发送、接受、讨论等手段,为表达自己在外交议题上的观点和要求提供了更加安全和自由的途径,通过网络世界自由倾诉对政治人物的期望。如中国每逢“两会”期间,网络媒体都发挥出容量大、快速、互动的特点,充分报道“两会”盛况。所有这些都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报道,能够直接的反映一国的政治和外交走势,有助于树立一国良好的国际政治形象,但也可以带来负面影响。例如2001年6月14日,小泉纯一郎内阁在网上发送电子杂志,透露“心里话”,当天有100多万民众注册申请免费杂志,有效地促进了官民沟通。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因其共同关心某一重大国际问题或者有相似的政治见解,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形成临时性的虚拟政治社团,由于其没有标志身份存在,不受限制,可以向当政者、决策者发表建议、施加压力,对外交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增加,“秘密外交”已成为历史名词。所以决策者和政治领袖采取何种政策、路线、方针,都要考虑到以大众传媒、民间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意,传统的舆论构成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影响已经浮出水面。

二、科技因素与外交决策的效率

(一) 科技的发展为外交决策提供新的手段。

“导弹飞行的时间越来越短,精确性越来越高,给与领导人危机做出反应的时间越来越少”。全球性新挑战与传统国际政治问题交织,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实力对比、竞争内容和形式日益改变,国际关系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不确定因素增多。所以外交决策的效率必须提高。现代化的交通、通信等密切了国际间的联系交往,提高了外

交决策的效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他国家职能部门可以在全世界穿梭往来,短时间内即可会面,直接干预协调国际事务,参与外交政策的执行过程。如高科技保障的国际热线能够使国家在了解事件动态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在国家高层沟通交换信息,减少或避免国际危机,减少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科技发展背景下的元首会晤、首脑峰会等活动频度增大。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为解决国际政治难题提供最重要的沟通渠道。

“虚拟外交”悄然兴起。国家及社会通过电子媒体互动以达到沟通目的或处理国际事。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外交决策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变化。美国、加拿大等国推出了即时使馆、虚拟团队。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人员可以互补结合,组合成虚拟外交团队,由网络连成一体,处理正在发生的国际议题,而不必将人员都召集在事件发生地。此外,外交部网站、网络外交人员职业训练、开展外交事务的计算机模拟等等都是虚拟外交的表现。中国外交部也开发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一体化的网络信息发布管理系统。

(二) 专业外交决策咨询机构直接提高外交决策的效率。

政策咨询机构已成为国家决策部门的“思想库”、“智囊团”,同样,在外交决策领域,政策咨询对于国家外交决策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外交决策咨询机构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为外交决策者在面对多种困难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提供可行的决策备选方案,以自己的智力成果来弥补外交决策者所负责任与个人精力、知识、能力之间的差距或不足。一项外交决策往往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广泛的领域,要想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必须集中多方面的人才,利用各种“思想库、智囊团”,从客观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论证,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菜单。以著名的兰德公司为例,该所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获有学位,其中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占八成以上,极少数没有学位学历的研究人员,也都是军人或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高层次的人才,既有精深的专业造诣,又有广博得知识素养,其出色的研究能力完全胜任了工作的需要。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小布什政府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查德·D·哈斯曾写道,“在影响美国外交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少为人所关注,……尽管思想库介入美国外交决策已达百年之久,但从来

没有发挥像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在美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政府、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中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形成美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他如被推崇为“世界上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研究所”著名民间研究机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库”,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和外交政策研究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等,日本有包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内的近300家研究咨询机构,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战略研究所等,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大西洋国际事务研究所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被认为是在搜集和研究战略均衡、军备竞赛和裁军情报方面最具权威的研究中心。总之,外交咨询机构为外交决策提供背景资料和最新信息,设计和提供政策方案,对外交决策进行监督和协调,提供调解渠道,进行宣传 and 制造舆论。

三、科技因素与外交决策的方法论研究

(一) 跨学科方法用于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

传统的外交决策研究通常把抽象的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和逻辑起点,未能深入到外交决策过程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机构中去探寻外交政策形成的原因。在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外政策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决策过程空前复杂,为使决策过程精确化和最优化,就必须建立对外交决策模式的研究,总结探索系统的方法论,引入现代科学方法,重视发展和借鉴现代咨询和政策设计的科学方法,将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大批新兴交叉边缘学科诞生,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影响和沟通论、耗散结构理论、统计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被引入到现代外交决策的研究中来,社会科学和数理科学相互融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产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例如比较系统的国际问题量化分析,通过建立特定的模型,运用数学和其他专业理论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关系、变化等,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准确的解释、描述许多现象的相互作用与发展趋势,有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得到更准确可靠的定性结论。此外,还有很多数理化的分析方式,对国际问题进行分析,使得人们开始

摆脱纯粹头脑中的逻辑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洞和虚幻的特点,解决了依靠人脑活动所不能解决的国家关系中的复杂难题,为决策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分辨外交决策的结果,检验和反思决策过程,为科学、合理的外交决策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对外决策科学理论研究日益丰富。

在二战以后,西方国际政治学者高度重视决策模式和理论的研究,围绕着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两大问题,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待政策的决定、执行过程,将对外政策的分析结构以明确的形式加以表现,对具体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丰富的对外决策理论。1971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总结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决策三模式:合理行为模式、组织程序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论证了为什么做出决策和如何做出决策及由谁做出决策的问题。托马斯·布卢尔于1980年设计出了“外交决策十模式”全面的概括了影响外交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诸如施耐德模式、弗兰克尔关于对外政策的决定模式等。后来如合理的选择理论、组织过程模式理论、认知(心理)过程模式理论等。^[7]罗斯·威尔逊的精英主导模式论和封闭协商模式或开放协商模式论,卡尔·多伊奇的梯形模式论,斯奈德的变项分析模式论,阿尔蒙德的社会权力结构分析理论,斯坦布伦纳的决策控制论,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式论,詹姆斯·戴维·巴伯的总统性格分析理论,史蒂芬·斯考罗尼科的政治时期理论等。^{[8](P138)}此外如外交行为影响论和沟通论强调外交行为的效果既取决于能否全面准确的把握对方,又取决于灵活适当的运用威胁允诺等手段和技巧。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系统的重要性,为科学化的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

总之,围绕着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外交决策研究异常活跃,就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展开了深入探讨。重视事态进程中的动态变量因素、采用人工智能等辅助手段的现代方法补充,丰富了重规范经验、运用历史方法、看重事件的个别特征、重自觉和理性因素的传统方法,使外交决策方法日益丰富。

四、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直接动力,“科技因素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

命的力量”。^{[9](P735)}“现代技术已成为国际关系——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外政策中的主要影响势力”。^{[5](P236)}现代高科技对经济来说是第一生产力,对军事来说是第一战斗力,对国际市场来说是第一竞争力,对国家安全来说第一保障力,对外交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现代科学实现了外交决策的现代化,促进了外交决策方式的变革,提高了外交决策的效率。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科技提高能增强本国外交分量,提高本国外交能力,都在用新的科技手段不断改善和充实本国外交,^{[10](P29)}中国外交当然也要利用科学技术,改进和提高外交决策能力。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多尔蒂,等.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邵伟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 [2] 金应忠,倪世雄.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3] 赵晓春. 发达国家外交决策制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 [4] Bruce Russett, Harvey Starr, Davi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M].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house, 2003.
- [5] 刘文海. 技术的政治价值[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6] 朱素梅. 信息时代的外交变革[J]. 国际政治, 2002, (4).
- [7] [日] 佐藤英夫. 对外政策[M]. 王晓滨译, 北京: 经济时报出版社, 1990.
- [8] 姜安. 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9]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0] 鲁毅. 外交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彭介忠)

Modern Scientific Factors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FU Jiahui¹, CHEN Yandun²

(1. Marxism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Modern science has extended the information scop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mproved the speed of feedback.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work by foreign affair consultation organizations, the systematic strategic theory has become the methodology to guide the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and ha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it. Modern scientific factors are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modern scientific factors; influence

(上接第 92 页)

A Dancer of Language ——Linguistic Analysis on Yan Geling's Novels

HUANG Wanhua

(Chinese Depart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her novels, Yan Geling has been seeking a language which is full of life and which is not to lose the verv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By turning what she feels about life into words and extending the resources of her mother tongue, and with a global sense in her mind, Yan has been making an effort to look for a narrative angle to express a language sensation comprehended at home and abroad. She presents a broad mind in using language. The characters and stories in her novels are not only limited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this helps Chinese language to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extension.

Key words: Yan Geling; language in the novels; local; abroad